

老虎本是一种凶猛的动物，因其凶猛而常常与有极大危险、且难于对付的事物相联系。

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: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，到蒋经国拿着尚方宝剑来到上海,放出话来:“只打老虎,不拍苍蝇”,再到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中成批地揪出危害国家利益的大小老虎。“老虎”逐渐从一种猫科动物，沦为反动派、敌人、不法奸商、贪官污吏的代名词。历史上的“大老虎”没有一个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没有一个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任何一只大老虎的养成必有其历史机遇,他的死亡同样也需要一点机缘。

朕的亲人变老虎

当我们开始总结“打老虎”的经验时,惊讶地发现“大老虎”们的死亡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——不作死就不会死。

春秋时期的国家还比较初级。国家本就有公室贵族们的一份儿，他们在自家封地上折腾是合理合法的,无非是上蹿下跳，想要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时,才会被收拾。说到底,还是自家的事情。等到秦始皇“废封建,行郡县”之后,封君变成了官吏,官吏渐变为家奴,这才有了贪污的概念,“大老虎”才真正出现。

掌握最高权力的滋味既美妙又难受。当皇帝有时候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,把手中的权力下放,抽身出来享受生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,把权力

交给谁放心呢?自然是身边人——亲戚，特别是娘舅。这些获得权力的自家人,往往滥用权力，变得飞扬跋扈,难以控制。时间一长,权力孵化出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。等到皇帝休息够了,想起了自己所肩负的政治道德和伟大使命时，他就要收回自己的权力,“打老虎”势在必行。霍光功劳再大,霍家照样完蛋;窦宪、梁冀均因“跋扈”被打掉。跋扈算罪吗?按照现代的法治思维,自然不能算。但是，对于那些曾经支持外甥皇帝的舅舅们来说,跋扈基本就是作死。

老虎尽是身边人

中国的专制体制经过千年打磨变得越来越集权，但分享皇帝权力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多，呈现出从亲戚向朋友演变的趋势。朋友比亲戚更亲近,皇帝与他的朋友之间有共同的爱好,共同的追求,共同的事业。这些曾经的朋友,在权力的滋养下,一个个变成了“大老虎”。先拿北宋



建国初期宣传画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》

谁是“大老虎”?

末年的“六贼”说事儿。蔡京、王黼、童贯、梁师成、朱勔、李彦,都是宋徽宗的朋友。当然，这几个都是“酒肉朋友”。蔡京、梁师成、李彦他们几个不是精通书法就是擅长雕刻,整天和宋徽宗一起欣赏珍奇的艺术品。这些珍宝都是王黼、童贯、朱勔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,他们借着“帮皇帝收集艺术品”的机会,贪赃枉法、横行霸道,弄得民不聊生。宋钦宗一上台，任用主战派大臣李纲,摆出一副“赵李新政”的格局,将“六贼”全部打掉!

除了朋友，保姆也是大老虎的一个重要“策源地”,那些抱过小皇帝的人,都有了当“大老虎”的机会。这类老虎在明朝尤为集中:王振、刘瑾、冯保、魏忠贤都当过小皇帝的“大伴”,小皇帝登基之后,他们很自然地分享了皇帝的权力。有朝一日小皇帝长大成人,视野开阔了,野心勃勃了,也就容不下陪他长大的“大伴”

了。以明朝的君权之大,士风之强,一句话,老虎就死定了。

发儿小长大或成虎

皇帝会有发儿小。雍正皇帝当皇子时,身边那位年羹尧,便属于倒霉的发儿小。

年羹尧凭借在潜邸的功劳，当上了抚远大将军，雍正初年又率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,再立下大功。之后,他加封太保、一等公,高官显爵集于一身。雍正在诏谕中口口声声说要和年羹尧“做个君臣相知的典范”。

“不作死就不会死”定律再次出现。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时,王公以下官员跪接,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,目中无人。后来,雍正给年羹尧的谕旨上有这样一段话:“若倚功造过,必致反恩为仇”。皇帝的话不是随便说的,几个月后,年羹尧这只“大老虎”就被几棍子打死了。

纵观史册，皇帝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,他的亲戚、朋友、仆人、奶妈、厨子、秘书,变成大小老虎是个高概率事件。当通天彻地的权力易手之后，又会有新的身边人,前赴后继地从人变虎。老虎又如何打得完?如果说高度权力是滋养老虎的温床，那消灭老虎的前提是消灭不受限制、不受监督的权力。如果我们把权力关进笼子，是不是连同老虎一起关起来了呢?
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2014年第6期 文/纪彭

“中山装”因孙中山成政治符号

在国际外交场合，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都常穿着根据中山装改良而来的服装。作为中式礼服的中山装,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。

作为反清革命的领袖,孙中山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，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性标志。早在1912年,孙中山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。

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,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、拖沓,因此,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。

立翻领，对襟，前襟5粒扣,4个贴袋,袖口3粒扣;后片不破缝。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,根据《易经》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。

其一，前身4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

(礼、义、廉、耻),袋盖为倒笔架,寓意为以文治国。

其二,门襟5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(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)。

其三，袖口3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(民族、民权、民生)。

其四,后背不破缝,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。

其五,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,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。

在民国十八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,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,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。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三民主义理念在服装上得到完整体现,中山装成为“革命”在

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。孙中山带头穿着中山装，中山装成为革命与时尚的象征,风靡一时,而后中山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。

中山装比一般意义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,容易使人们将具有三民主义象征意义的“代码”透过穿着中山装的身体实践嵌入身体空间而化约为无意识,而这种无意识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最为深入。

中山装的诞生,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，颠覆了中国人原有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。中山装的流行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，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。

中国新闻网 2014.4.2 文/陈蕴茜

康熙下令绘出首部中国实测地图

最近,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时,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一件意外的礼物:“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。”其实,另一幅更早绘制的中国地图,也不应该被遗忘。这便是由康熙主持测制而成的中国第一部实测全国地图《皇舆全览图》。

17世纪后期，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使教会力量空前壮大。而能留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，大都擅长科学,这是和帝国的需要分不开的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清政府与沙俄在尼布楚谈判时，康熙帝深感缺乏精确的地图,会给侵略者以可乘之隙。为统一全国,巩固边疆,康熙帝酝酿绘制

一幅既全面又精详的全国地图。在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,他下令进行一次涉及全国的地图测绘工作。于是,来自法国等国的传教士们和康熙皇帝的官员们，为绘制中国地图进行了10余年精诚合作。

这次测绘工作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。从1708年到1718年,白晋、冯秉正、雷孝思等数十名传教士带领满汉官员分赴中国各地进行测绘。1717年，康熙命白晋等人负责汇总,最终集成包括中原各省、满洲、西藏及朝鲜的全国总图,于第二年制成《皇舆全览图》和各省分图稿共32幅,并刻印成册。此时,天山南北尚处在准噶尔部的控

制之下,故《皇舆全览图》的西部只绘制到哈密为止。乾隆时,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,清廷即派员到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,增加了新疆地图范围。

随白晋来华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在完成康熙皇帝的使命后,将此图送回法国,辗转交到路易十四手中。法国王室地理学家根据此图做成《中国新图》,在欧洲出版。至此,欧洲人对中国地理概貌有了比较正确、完整的了解。《皇舆全览图》因其精确度高,故得到广泛使用。直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地图,仍以此为根据。也就是说，它作为惟一的全国地图使用了200年。

摘自《世界知识》《文史杂志》

腹语术起源埃及

用舌、齿、唇共同运动,通过口腔共鸣来完成发音过程。其实人的发音器官不止这些,而且比想象复杂的多。人类发音器官的整个装置像一架乐器，大致分三个部分:动力系统——肺,发音体——喉头和声带,共鸣腔——口腔、鼻腔、咽腔。实践证明,用嘴说话不是唯一的说话方式，但它却是最省力、最便捷的一种方法。而腹语只不过另一种说话的方式而已，腹语是用腹式呼吸为基础，在舌肌和腹肌的共同协助之下,以嘴唇不动(不是绝对不动)的形式用丹田气息打在声带上造成声带震动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另外一

今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中，台湾腹语大师刘成表演的《空空拜年》，再次引起了大家对腹语的兴趣与好奇。那么,腹语是真的吗?

其实,腹语术是一门十分古老的技艺,据说起源于古埃及，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。我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腹语的记载,常被称为“肚仙”,用来做迷信骗人的把戏。在西方中世纪，很多腹语术家被认为是掌握“邪术”而遭受迫害。近代以来,腹语术在国外重新流行,鼎盛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,在美国被频繁地运用在广播和电视里。

刘成说,“一般大家都以为腹语是用肚子说话，其实真正说话的还是嘴巴”。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张春秀曾对腹语发声做过专门研究，她说:“我们平时说话

华表原为“诽谤木”



天安门前华表

如今，到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大多都会到华表前留个影。位于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，不仅是天安门广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更被视为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。其实,如此威严壮观、高高矗立的华表，最早源自一种用来纳谏的木柱,名曰诽谤木,其造型是在一根柱上横钉一块木牌。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，朝廷门前都要竖立这么一根诽谤木，便于百姓在上面书写谏言,针砭时弊。

古代的“纳谏之柱”为何用诽谤二字冠名?翻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不难发现,诽谤的解释是“无中生有,说人坏话,毁人名誉”。然而,在中国古代,“诽谤”二字本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。《说文》中曰:“放言曰谤,微言曰诽”,也就是说,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,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。而且,诽谤一词本身还含有“进谏”之意。古人将“纳谏之柱”称为诽谤木贴切得几乎无可替代。

诽谤木也叫谤木、桓表、华表木,既可以让人进谏,书写人们对时弊的观点、看法,供王者采纳,同时还可以标明路衢,指示交通,相当于今天的道路指示牌。

对于诽谤木的作用,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中云:“古之治天下,朝有进善之旌,诽谤之木,取谏之鼓。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”。

由木头制作的诽谤木演变为雕刻精细的石柱,形成蟠龙缠绕的华表,据考始于汉代。从东汉开始,华表渐渐地出现在陵墓前,成为“墓表”或“神道石柱”。唐宋时期,华表作为路标的功能逐渐消失,逐渐演变为象征性建筑,立于皇宫、皇陵等建筑的前面。在岁月的流逝中，华表已经完全失去了其最早的纳谏功能，但华表最初作为诽谤木的历史却仍然值得人们深思。

《北京晚报》2014.3.28 文/马吴宗